

邹恒甫 / 编著

最后的

狂人

我就是邹恒甫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013027385

K825.31

52

邹恒甫 / 编著

最后的 狂人

我就是邹恒甫



K825.31
52



北航

C1635228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0305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邹恒甫 编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4
ISBN 978-7-5060-6132-2

I. ①最… II. ①邹… III. ①经济学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6555 号

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

(ZUIHOU DE KUANGREN: WO JIUSHI ZOU HENGFU)

编 著 者：邹恒甫

责任编辑：徐 玲 李治华

出 版 社：东方出版社

发 行 社：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 厂：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2.5

字 数：323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6132-2

定 价：45.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代序

邹恒甫：为什么要做中国的堂吉诃德？^①

2012年10月下旬，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CEMA）院长办公室里空无一人。经济学、数学英文原著，文、史、哲各类书籍在办公桌上堆成了山。最显眼处，是一套离开前已经拆封翻阅的全三册《南渡北归》，该书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学术追求。书旁摆着一盆初长成的君子兰，这是教师节CEMA十几名博士生联合给他们的老师邹恒甫先生送的。翠绿的叶片上附着张简易的红色贺卡，上书“邹老师，节日快乐”。

邹恒甫还没有看到这份学生们精心准备的礼物。自8月底离京后，邹恒甫至今没有回来过。在美国华盛顿的家中接受《人物》记者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回京，他回答，“在等官司的公示。”

8月31日，因微博爆料“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邹恒甫被北京大学以“侵犯名誉”为由正式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并获立案。这是邹恒甫始料未及的，他坦言对北大要打官司感到万分惊讶却又荣幸之至：“我以前说腐败、贪污的事情都没人管，现在这么点一下生活作风问题，却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他操一口口音浓重的湖南普通话，大胆臧否人物一如往常，不时哈哈大笑，连称“太好玩”、“太过瘾”。

^① 这是2012年第11期《人物》杂志对邹恒甫的采访报道，由记者李光敏采写。

“那么大的一个北大，挑战我一个小萝卜头邹恒甫，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我的光荣啊。”

位于北京学院南路的中财校园很小，散步时，不到20分钟，邹恒甫先生便可以绕校园一圈。但唯在这里，他得到了最大的办学自由——在邹恒甫看来，无论资金，还是办学理念，中财校方对他的支持可谓“毫无保留”。2008年4月5日，邹恒甫的夙愿终于达成——中国高等研究院（CIAS）在中央财经大学成立。

其时，他正因与北大光华的纷争而备受质疑，这场风波至今硝烟未尽。除了少数几个朋友偶尔聚会，邹恒甫不参加任何应酬。他每天除了做研究、上课，就是睡觉、吃饭、遛狗、散步，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叫上他的学生罗长林。心里有事时，邹恒甫即便服用安定，还会整夜睡不着觉。“学校的会议他好像都不参加。要让他乖乖地坐在一个姓名牌后面，他受不了。我印象中他参加的会只有两个，一个是教师职称评定的会，一个是学校的毕业典礼。即便这种会，之前他也会紧张，头一晚就睡不着觉。”罗长林说邹恒甫非常厌烦这些场合。

另一方面，罗长林却发现邹恒甫乐于和普通人交流并从中获得乐趣：遇到环卫工人整理枯草，邹恒甫会跑过去，抢过人家的耙子，兴致勃勃地帮人家把整片草地收拾干净才罢休，还连称“我也是农民出身”；夏天看到有人在路边河里游泳，他会脱了衣服，穿着裤子就跳进去；高兴的时候，他会手里拿根青草，伴着节拍哼些《东方之珠》、《女人花》之类的老歌。

小区太小，他有时候遛狗会串到隔壁小区去。保安们见这位总是穿同一件条纹Polo衫的卷发男人整天无所事事，有些瞧不上他。他却一点不计较，熟了，还老去跟保安们斗地主玩。邹恒甫不好意思赢保安们的钱，总是每次带两百块，输完就回家。

在一些三四个朋友聚会的场合，邹恒甫直言，比起人，他更愿意跟狗打交道。“狗哪儿有人那么多心眼？”在中财和美国华盛顿的家中，他分别

养了一条狗，一条叫牛顿，一条叫爱因斯坦。和《人物》记者多次的越洋通话中，总有狗吠相伴，而电话那边邹氏风格的骂声更是滔滔不绝。有时他会突然停顿一下，说“狗和孩子都睡着了”。记者抱歉地想结束通话，可邹不允，关于他这一生经历过、纠缠过、痛骂过的人和事，他得说痛快、骂痛快了才过瘾。

同学们都不喜欢我，因为我比他们成绩都好

自少年时代，邹恒甫就立志当一名老师。如果历史的车轮顺着“文革”继续向前，邹恒甫中学毕业后若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就要“上山下乡”。命运的转折恰巧在他高中毕业那一年出现：1977年底，高考制度恢复。不少“老三届”的学生在“文革”中浪费了10年光阴，他却刚刚好，赶上恢复高考的“头班车”。1978年2月，当来自湖南岳阳华容小镇的少年邹恒甫走进武汉大学校园时，还要再过3个月，他才满16周岁，是经济学系70个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的很多同学，都已经到二三十岁的年龄，最大的一位已经32岁。

那个时代刚刚过去，“斗资批修”的阴影犹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因为被经济学专业录取感到耻辱，除了父母，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将要学习这个专业。“我们都以为经济学就是打算盘，不好意思告诉别人。”1978年春，胡乔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章，肯定价值规律和市场。中国经济学的春天开始到来。邹恒甫在武汉大学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学大变革的时期。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有两件事情影响深远：一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反思；二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前者以董辅初先生为首，包括于光远、薛暮桥等一批前辈，他们大胆深刻地反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尖锐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后者则以张培刚、陈岱孙、吴纪先、谭崇台、厉以宁等为代表，他们大力引进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理论。

武汉大学把最强的师资配给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经济学系更

是群星灿烂，有张培刚的学生曾启贤，从哈佛回来的谭崇台、吴纪先、刘涤源，从耶鲁回国的李崇淮、周新民，从威斯康星毕业的朱景尧等一大批解放前就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物。“我认为我当时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加上得到西方经济学的熏陶，使我在同辈人中有很强的优越感。”邹恒甫说。

董辅初有一句话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你们学经济学一定要学好三样东西，一是要学好数学，二是要学好形式逻辑和哲学，三是要学好英语。”在时任校长刘道玉推行的学分制下，邹恒甫获得了巨大的选择自由。很轻松地应付了经济学专业的课程之外，他几乎把所有剩余时间都用到了数学、英语和哲学专业的学习上。

经历过“文革”的这些年龄比较大的同学都在用老方法苦学专业，而邹恒甫不但专业成绩好，还涉猎大量数学、哲学和历史的西方著作。之前都在“批林批孔”，但邹恒甫却说，很多西方学者对孔子评价很高。他一位同班同学用“天才”和“神童”形容他。另一位同学张循礼回忆，邹恒甫的厉害在于他不仅聪明，而且勤奋。邹恒甫很少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但因为他小，大家都能够包容他。”

在多位昔日同窗的回忆中，这位少年天才深得同学们的爱护，他自己却说：“同学们都不喜欢我，因为我比他们成绩都好。”

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

1981年春天，南京大学有一个关于西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项目，邹恒甫因为数学基础好，被选去交流一个月。那是国内第一次正式将西方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引进来。在毕业时的英语考试中，邹恒甫名列全校第二，第一名和另一位并列第二的均为当时武汉大学英语系的老师。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与西方隔绝三十多年后，中国开始每年向西方国家派出少量公费留学生。1981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部分部属重点大学选

拔首批出国留学学生，武汉大学是受委托学校之一。1982年，邹恒甫被推荐去比利时鲁汶大学，却因年龄太小被拒绝。随后他又申请了法国一所学校，也没有等来消息。“用我们家乡的话说，邹恒甫是最没有用的，比利时都去不了。我其实是在很风光的时候，一下子就掉了下来。”邹恒甫说，他甚至做好了在国内读硕士的准备。他自己申请了哈佛的博士和威斯康星的硕士。早年留学哈佛的经济系主任吴纪先亲自写信给他哈佛的老师列昂梯夫（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哈佛中国经济研究权威珀金斯，向他们推荐邹恒甫。

1983年3月1日，邹恒甫收到了来自哈佛的录取通知，却不敢告诉别人。“我一看，那张纸很漂亮，就认为是假的。”直到3月7日，他收到珀金斯的亲笔信，心里才有了底，并与老师吴纪先分享了这一喜讯。5月，命运再次横生枝节——威斯康星的录取通知来了，且学费比哈佛低得多，邹恒甫被教育部批准去威斯康星。对此，邹恒甫很失望，却又无可奈何。

吴纪先给校长刘道玉打电话，称邹恒甫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他激动地说：“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吴纪先甚至以辞去系主任相“威胁”，希望校长说服教育部改变决定。邹恒甫没抱太大期望，他安慰吴纪先：“实在不行，我可以先到威斯康星，然后转到哈佛。”但老先生说：“不行！要一步到位。”刘道玉亲自到教育部找蒋南翔部长斡旋，终于促成邹恒甫的哈佛之行。他的同学简新华回忆说：“因为哈佛大学的学费是别的学校的三倍，如果把邹恒甫派到哈佛大学，国家可能就要减掉两个出国留学生的名额，当时国家的外汇非常少。教育部特批邹恒甫去哈佛大学学习，他特别高兴。这应该是对武大、对国家特别感恩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9年5月，邹恒甫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以大力改革而闻名教育界的刘道玉也在邹恒甫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邹恒甫投身学术教育之后也一心想像他的老校长那样建设自己的学术“理想国”，哪怕刘道玉是改革的失败者。

如果不是 1988 年刘校长出事的话，我就不会要这个哈佛博士啦

1987 年，邹恒甫应校长刘道玉邀请，第一次回母校讲学。在他介绍现代经济学的讲座上，参与交流的老师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有的甚至直接站起来批判他。“他们觉得我太奇怪了，怎么这样否定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呢？”邹恒甫回忆说。

在邹恒甫看来，当时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已经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在与西方隔绝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学术基本是空白。邹恒甫大学时代崇敬的老先生们，都曾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数十载过去，当他们重新以一个学术人的身份走出去与国际同行对话时才发现，他们已经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西方经济学早已经数学化。而在邹恒甫首次从哈佛回来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虽然国内一些高校经济系已经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却都只是用于批判。刘道玉让邹恒甫尽快回来教授西方经济学。“如果不是 1988 年刘校长出事的话，我就不会要这个哈佛博士啦。”还在哈佛求学的邹恒甫动心了，但时事没有给他机会。“刘校长被免除职务，哇，我就跑出来啦。一下子刘校长家里电话线都被拔掉了。当时家里有一个电话是了不起的。刘校长下台以后，还有好多小报告打到上层机构，检举到教育部，说他请了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邹恒甫回来讲课。”

邹恒甫没有放弃。1991 年，进入世界银行不久，他就动了一个念头，想在国内组建一个先进的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由于当时政治环境还很紧张，直到 1993 年此事才有了眉目。1994 年，在武大梅园一间不起眼的小平房里，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在揭牌仪式上，董辅初给予自己的弟子以高度期望，他说：“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经济学的革命有两次，一次是 1947 年张培刚先生从哈佛回到了武大，第二次就是现在，邹恒甫从哈佛回来了。”

邹恒甫将武大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称为“小 IAS”。1930 年，美国

成功的百货商人路易斯·邦伯格兄妹在普林斯顿小镇投资成立了一家名为IA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的研究院，历经八十多年发展，IAS 如今成了一个汇集全球顶尖学者的学术圣地，从这里曾涌现出 22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另有 34 名教授获得过各自领域的全球最高奖。但两者是根植在各自不同的土壤之上的，一个根本不同是，普林斯顿 IAS 的宗旨是为各领域各学科的科学家的提供纯粹的尖端研究场所，不受教学任务和科研资金甚至赞助商的压力。邹恒甫的 IAS 却远难达到这一点。

当时，中国已经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人们的思维还未完全转化。要在经济学领域建立一套与传统经济学完全不一样的理念和研究方法，乃至成体系地推动，必然面临各种阻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龙永红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从事现代经济学教育，在他看来，当时的武汉大学允许邹恒甫自主尝试，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勇气。

忽然一下，你找到了一个秘笈

同学们都说“四无”（无钱、无教学办公用房、无师资、无教材）办学的邹恒甫是回国办学的武训，一位深悉邹恒甫办学历程的朋友却更愿意把他比做那个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在他看来，邹恒甫办学面临的很多压力，表面看是人的问题，实质上这些问题更多是体制造成的。有人给邹恒甫泼冷水，认为他做此事会费力不讨好，但他依旧坚持，要在中国办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教育。

在一些场合，邹恒甫和同学们会为现代经济学的地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的同学认为，现代经济学确实“更符合未来的走向”，“但你要搞得全球都是这样的东西，那不可以”，“比如说你认为搞经济就是搞计量经济学，那传统经济学呢？大量搞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人，他们靠这吃饭的，那也是社会绝对不可或缺的东西，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的鲜明性格决定了他一定会碰到非常多的困难，但同时也成就了他。如果他

中庸一点，要照顾那边、照顾这边，可能做不到今天这样。他是根本什么都不管。”邹恒甫的同学这样对《人物》记者评价。

没钱，他请朋友们募捐。他的老师董辅初自己掏出8000多元给中心购置了第一台空调，还发动他所有能赚钱的学生都给中心捐钱。没有教学用房，他就向学校要，从梅园的两间平房到后来财务部楼上，中心多次更换办公场所。没有教材，邹恒甫就自己从美国扛回大量原版经济学教材复印后发给学生。他还亲自写好讲座、招生海报，和他的同伴一起到校园各角落粘贴。

如今回想起来，邹恒甫还是觉得那句英文谚语说得好，“The old days are good days.”他说，自己拿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但为了钱办学就一点都不过瘾。

1996年，邹恒甫如愿以偿，开始招收“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参照普林斯顿IAS的课程体系，所有的学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数学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学习。他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教授，为他们开设数学系本科全部课程；他在全国最早全部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许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都被他请到武大来给学生们上课，他们包括谢丹阳、阮志华、陈志武、周忠全、朱晓东等。当时回来讲学的学者们曾开玩笑，在邹恒甫那儿讲课，是要“放血”的，不仅没有分文讲课费，往返路费也要自己负责。一贯以自我为中心的邹恒甫说起这段也有些唏嘘：“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靠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

邹恒甫把业余时间都给了IAS。一位深悉邹恒甫办学历程的朋友回忆：他印大量的公益性的材料，大家都可以看，世界银行那些不花钱的材料，他就是往回背啊。他对办教育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很痴迷的状态。每次回国，虽然世界银行给他报销回国的商务舱机票，但为了省钱，他通常都选择从北京坐火车站15个小时到武汉。2007年，邹恒甫备受质疑之时，在美国耶鲁等名校留学的18位IAS学生写信支持他们的“邹老师”，信中详述了这位哈佛博士兼世界银行官员坐火车的细节：“从1990年到1998年，您坐飞机头等舱一到北京，便改火车站票去武汉。我们帮您扛书箱子，但

您比我们更有力量。您同我们一起在拥挤不堪的硬座厢里打拱猪牵羊，起一张牌和出一张牌都同我们鞠躬……每次，我们都挤在硬座厢的厕所旁，受尽了来往客人和列车服务员的白眼……”“站票，一个座位都没有，一直站到武汉大学。这一定要省，实际是在为教育省钱。他确实能省下一切的服务、待遇，为什么呢？就为了这个教育。”曾经在北京接待过邹恒甫的一位朋友说。

IAS 带来的现代经济学的清风，吸引了武汉乃至全国各高校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老师和学子。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当时在武汉大学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尹恒这样描述 IAS 带给他的影响：“就好像一个练武功的人，练了一辈子武功，却苦于上不了层次，在江湖上被人打得东奔西走，忽然一下，你找到了一个秘笈——那就是那个时代的武功秘笈。”

邹恒甫从国外带回来的“武功秘笈”也的确惠及了一代人。尹恒告诉《人物》：“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一代搞经济学的学者，很大一部分人的现代经济学核心教材和原版著作的信息，是受到那个时候武大 IAS 的引导的，或者说直接来源于 IAS。”

这个专业是搞死人的专业

在武大 IAS，邹要求学生大一第一学期修初级经济学，第二学期修中级经济学，用以熟悉经济学英文教材，大二开始上高级经济学课程。所谓高级，即国外一流学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教材。同时学生们还要兼修相当数量的数学课程，包括英文原版的数学分析原理、动力系统、时间序列分析、拓扑学等。据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的学生回忆，大一时，学生宿舍几乎没有人是两点以前睡觉的。初上大学的人都比较迷茫，邹恒甫的学生尤其如此。“他可能自己觉得理论很重要，但他没有让我们真正明白。”一位武大 IAS 的学生回忆，有些年，邹恒甫乐于从美国打长途电话给他的学生们。在男生宿舍，他会让人把实验班所有男生都召集到一起，

按了电话免提，他便开始给他们“上课”。主题不外乎两个，除了批评国内的经济学家们，便是告诉学生们要专心学术，不要去政府，不要去投行“摸钱”。曲高和寡在所难免。学生们听完，精神短暂振奋，但平时接触的人、面临的话题都太实际。久而久之，电话那端滔滔不绝的时候，电话这头渐渐意兴阑珊，只偶尔有人凑近电话机“嗯嗯”回应两声，以示有人在听。

2001级实验班上八十多个同学，继续留下来念硕士的，只有二十来人，其余要么本科毕业便找了工作，即便读研也去了别的学校或别的专业。“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继续留下来读研的话，会继续本科时代的‘高压’生活。”2001级实验班学生曾辰航说。

也有坚持下来的学生们，是后来才领悟到武大那几年辛苦对他们的意义。2000级实验班的李三希后来进入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经过第一年的淘汰机制，班上四十多人只留下了十来个，李三希是其中之一。“我们比较有优势，在那儿学的那些东西，我们本科就学过了，所以我学来就很轻松。”李三希说。

1998年8月，在中山大学，邹恒甫见到了时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的张维迎。彼时，武汉大学国际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已经步入正轨。张邀请邹到光华办一个与之一模一样的班，初定由邹管宏观经济学，张管微观经济学。

在邹恒甫报到后，光华管理学院新增了一个系——应用经济系，“我只想当个‘班长’，但张维迎硬让我当系主任。”邹恒甫要求老师们都用他指定的英文高级教材，且必须用英文授课，“他们都受不了，都跑掉了，我就变成孤家寡人了。”实际上，他也几乎不给原光华的教授排课，因为“他们水平都不行”。邹恒甫决定另起炉灶，他将在武汉大学办学时的人马全部拉到了光华，同时去北京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找老师来上课。

“当时张维迎是挺我的，他要利用我把光华神气跋扈的教授都打压下去，我确实做到了。”邹恒甫“哈哈”笑着回忆他和张维迎的“蜜月

期”。

按照课程设置，该系学生必须修满经济学和数学两个学位的课程。研究生培养计划随之改变，很多课程学生们必须重新学方能毕业。1998 级的博士生则可能面临无法毕业的尴尬境地。他们在邹恒甫的课堂上把他围住，险些打起来。“我说原来的计划是别人制定的，现在我是新的系主任，你们必须听我的。他们说我不对，我说那你们把我搞死啊。他们都要疯掉啦。”邹恒甫说：“后来所有本科生都不愿意考我们的这个专业，知道我们这个专业是搞死人的专业。”

我把别人的既得利益都搞掉啦

在武汉大学，资金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邹恒甫。为了让优秀的学生专心做学术，他在 IAS 设置了比其他学院高得多的奖学金，最高可达 10 万元以上；他想请国际一流的大师都到武汉大学讲课，但多数人收费不菲；IAS 的课程需要教师具有极好的数学与英文基础，原武大经管学院老师在他看来大多不能胜任，他只能到数学系另请老师，实在不得已，只好请博士带硕士，硕士带本科。这些，都不是学校给予的有限经费和他个人募捐所能维持的。最艰难的时候，眼看过两天就要发工资了，邹恒甫还没搞到钱。

2001 年，武汉大学商学院有关领导到光华考察其在全国率先开办的 EMBA 学位项目，有人建议武大也开办一个。但由于种种原因，商学院并未马上启动。2002 年，邹恒甫牵头做了一个 EMBA 项目培训方案，请了一批国际上的知名教授前来授课，正式开始招生。邹恒甫说，2002 年至 2005 年，是武汉大学 EMBA 最火爆的时候，他把几乎所有国际上的应用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大师都搬到了武汉大学。除郎咸平、张五常曾到武汉大学讲过一两堂课外，武大 EMBA 项目几乎不请国内学者讲课，武大商学院的教授们自然也被排挤在师资队伍之外。

“我把别人的既得利益都搞掉啦。”这一点，邹恒甫非常清楚。邹恒甫

认为，武大 EMBA 对北大、清华和长江商学院等都是个巨大打击。武汉大学 EMBA 拥有高水平国际师资队伍，却收取比它们低得多的费用。“显然，这对于原来的利益格局构成非常大的冲击。”一位与经济学界诸多知名人物交往甚深的商界人士对《人物》记者直言，邹恒甫高薪邀请国外学者授课，而不给国内学者机会，必然导致一些人不满。

眼看办学的种种掣肘因素都被突破了，2004 年，邹恒甫却一下子陷入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那年夏天，邹的哈佛校友、世界著名经济学家、57 岁的让·雅克·拉丰，55 岁的杨小凯，还有他的老师董辅初，都因患癌症永远离开了他。他们都曾在他的不同时段照亮他，并一直陪伴他。杨小凯是邹恒甫多年至交，他和另两位一起，始终支持着邹恒甫在武大的办学事业。武大 EMBA 中心有三个联合主任，除了邹恒甫，另外两位便是董辅初和拉丰。拉丰得知自己患癌症后，打电话给邹恒甫：“恒甫，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了，我再也不能帮助武汉大学 EMBA 了，我再也不能帮助中国了。”

与此同时，EMBA 办学中巨大的经济利益，使邹恒甫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有人认为，邹恒甫让自己的亲妹妹邹三毛打理 EMBA 的一些具体事务，就是为了从中牟利。他的一位朋友回忆，最初邹恒甫拿回的资料遗失率特别高，“他就给我讲，他要叫三毛去帮他看住，不让人动手脚。”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谢丹阳在一篇《品邹恒甫》的文章中回忆，一次他到武汉大学讲学时，邹恒甫说中心的账目很让人费解，准备请妹妹三毛来管。他警告（邹）三毛：“你要是做任何违规的事，你就是坑了你哥。”

邹三毛由此被卷进日后的一些争议中。她被质疑在国内有 5 套商品房，还开高级轿车。邹在 2007 年 8 月底专门发博客澄清，称自己妹妹只有一套公寓，她的车也只是 IAS 的公用车，很多时候，他妹妹扮演的是司机的角色。他的多位朋友都认为，以邹恒甫的性格，他本不愿沾染 EMBA 这样的事情。邹恒甫称，他在武大之所以钟情于 EMBA，唯一希望的，就是拿 EMBA 的钱把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大师都请到武大来讲课。

EMBA 解决了困扰邹恒甫的经费难题。一直以来，财权都集中在武汉大学，跟商学院没有任何关系。但好景不长，2005 年，由于 EMBA 学位批准的权力被放到了商学院，武大 EMBA 项目被收归商学院管理。IAS “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系” 也被拆分到经管学院不同的系。2005 年 8 月，邹恒甫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傲气的他拒不上任。他黯然离开武汉大学。“2005 年，我在那儿吃了餐饭，就不再理睬他们了。他们也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就不斗了。我不是为了钱才斗争的，而是想用那个钱来办学。只有你们这些窝囊的人想要那个钱，那我就让你们搞钱去吧。所以我就把人全部带到了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我没讲过一堂课的 EMBA，我反感那个东西。” 邹恒甫说。

在武大，邹恒甫连续 4 年评博导，都被告知卡在了投票环节。一位与邹恒甫交往数十年的朋友认为，如果国内的大学教授像美国的哈佛、耶鲁教授一样，有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的话，邹恒甫会是很重要的中心人物。但是，“当整个评价指标是一个行政指标的时候，邹恒甫，对不起，你就是一个另类。” 外界人评价邹恒甫办学遭遇的挫折，多以为他不懂中国国情。

但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这么看。一位跟随他多年的身边人在发给《人物》记者的邮件中说：“很多人就不相信，社会上真有他这种敢于不管不顾地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多数人到他这个位置，是完全可以混得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他是何苦呢！他是真不懂吗？中国的人情世故他能不知晓？当然，也可以说他确不知晓，因为他从心底里完全拒绝这种人情世故。”

一起办学的伙伴相继离去，办学又受重挫，“我一个人斗不下去了。” 邹恒甫回忆。那个时候，嘴上一向藏不住事儿的他却把所有灰色的情绪埋在心里，他与武大的矛盾远没有后来与北大的纠纷那样闹得沸沸扬扬。“你知道丁学良怎么跟武大领导说的吗？‘把邹恒甫搞走，你就把一个跨国公司变成了一个乡镇企业。’我可以走，离开武大，悄悄的，因为她是我的母校，我不说她。”

简新华认为邹是有中国情结和武大情结的人，“你可能看了很多报道，他尽管骂这个骂那个，说这个说那个，但是好像没骂过武大。”

骂我的人都学我

2012年5月，邹恒甫五十大寿，在国内有教职的学生们集体给他过了一个生日。他在饭前作了简短发言：“今天是谷雨，也下雨了，下雨好。今天谷子也很多。你们都是谷子，不一定是种子。种子不多也不要紧，有一粒两粒就行了。”学生们都明白，他说的种子，是指学术的种子。

邹恒甫当年播下的种子不少已经发芽、成长，并在各高校推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学教育。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在写给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 Reinikka 教授的信中，这样评价邹恒甫：“从1992年开始，他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其中一些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已经归国任教。让人兴奋的是，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林毅夫认为，邹恒甫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和机构”。

林毅夫晚邹恒甫两三年在中国开始办学，从这个层面而言，二人当有很多惺惺相惜之处。只是，由于各自经历的不同，两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推动方式。相比林毅夫的“四平八稳”（邹恒甫语），个性鲜明的邹恒甫选择了更彻底、激进的方式。

他在电话里跟《人物》记者提起鲁迅的文章《无声的中国》，鲁迅写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除创办武汉大学 IAS 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外，邹恒甫不遗